

新中国60年

农村发展之路

主 编 秦兴洪 廖树芳 谢迪斌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中国60年 农村发展之路

主 编 秦兴洪 廖树芳 谢迪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 60 年农村发展之路/秦兴洪, 廖树芳, 谢迪斌主编.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61 - 3811 - 7

I. 新… II. ①秦… ②廖… ③谢…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中国 IV. 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606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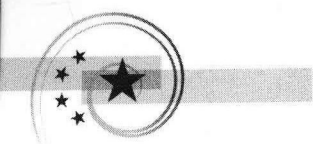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7232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印张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绪 论 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	(1)
一、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动荡	(1)
二、农村发展的桎梏	(5)
三、改良农村的种种药方	(10)
四、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15)
五、本书的架构和主体内容	(20)

第一篇 中国农村旧貌换新颜

第一章 中国农村改造的战略	(23)
一、依靠和教育农民	(23)
(一) 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23)
(二) 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	(24)
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29)
(一) 一以贯之的思想	(29)
(二) 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31)
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33)
(一) 努力达成共识	(33)
(二) 分步实施的战略	(35)
(三) 具体的操作原则	(36)
四、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39)
(一) 反对剥夺农民	(39)
(二) 重农不能抑商	(41)
(三) 发展集体经济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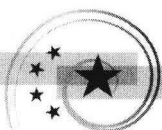
第二章 中国农村发展的宏伟蓝图	(44)
一、把握基本国情	(44)
(一) 认清中国社会性质	(44)
(二) 全力抓住社会主要矛盾	(45)
(三) 娴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47)
(四) 基本国情：“一穷二白”	(48)
二、确立战略目标	(49)
(一)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49)
(二) 实现农业现代化	(56)
三、谋划总体发展战略	(60)
(一) 发展大农业	(60)
(二) 大手笔规划	(62)
(三) 城乡必须兼顾	(63)
第三章 变革所有制关系	(65)
一、耕者有其田	(65)
(一) 土地回老家	(66)
(二) 划时代的改革	(69)
二、农业合作化	(71)
(一) 由互助组到初级社	(72)
(二) 由初级社到高级社	(75)
(三) 功过得失评说	(78)
三、人民公社化	(79)
(一) 公社旋风席卷大地	(79)
(二) 大变革后大整顿	(82)
(三) 沉痛的教训	(84)
第四章 探索发展路径	(88)
一、农村基层组织架构	(88)
(一) 高效的动员机制	(89)
(二) 严密的控制系统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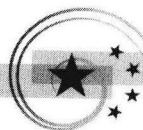
二、五花八门的“大跃进”	(96)
(一) 准军事化的组织方式	(96)
(二) 钢铁元帅升帐	(98)
(三) 技术革新与浮夸风	(99)
三、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	(100)
(一) 堵住资本主义的路	(100)
(二) 营造“左”的氛围	(103)
(三) 对阶段斗争形势判断失误的原因	(106)
四、典型引路	(107)
(一) 为“穷棒子”崛起叫好	(107)
(二) 扭曲的典型	(109)
(三) 全国农业学大寨	(109)
附：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穷棒子社”	(114)

第二篇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富起来

第五章 全新的发展思路	(118)
一、深刻地反思	(118)
(一) 对“左”的错误说“不”	(118)
(二) 在逆境中抗争	(121)
(三) 勇闯“禁区”的先锋	(124)
二、对国情的再认识	(126)
(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26)
(二)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129)
三、改革才是出路	(132)
(一) 分阶段推进宏伟目标	(132)
(二) 提升改革意识	(138)
第六章 改革春风满神州	(143)
一、打破旧体制的坚冰	(143)
(一) 推广家庭承包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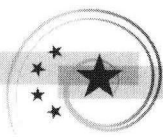
(二) 废除人民公社	(147)
(三) 完善双层经营	(149)
二、向市场经济转轨	(151)
(一) 改革流通体制	(151)
(二) 调整产业结构	(154)
(三) 构建服务体系	(156)
三、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	(158)
(一) 乡镇企业的崛起	(158)
(二) 农村城镇化再启动	(162)
第七章 重构农村基层组织	(168)
一、农村市场经济的新要求	(168)
(一) 改革农村组织架构	(168)
(二) 解决农村社会问题	(170)
二、农村基层组织新架构	(171)
(一) 农村基层政权	(172)
(二)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174)
(三) 村民自治组织	(179)
(四) 乡村经济组织	(182)
(五) 事业组织和群团组织	(184)
三、建设一支好的乡村干部队伍	(186)
(一) 关键在人	(186)
(二) 提高乡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189)
第八章 辉煌的成就与宝贵经验	(194)
一、繁荣兴旺的农村经济	(194)
(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194)
(二) 农村产业结构初步优化	(195)
(三) 农村市场欣欣向荣	(198)
(四) 农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200)
二、走向致富路的中国农民	(201)
(一) 亿万农民生活大改善	(202)



(二) 农民观念的更新	(204)
(三) 农民的流动与分化	(206)
(四) 农民地位的提高	(209)
三、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210)
(一) 解放思想换脑筋	(210)
(二)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212)
(三) 政府角色大转换	(212)
(四)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213)
(五) 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214)
附：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安徽省小岗村	(215)

第三篇 开创农村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第九章 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221)
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再规划	(221)
(一)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221)
(二) 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22)
二、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225)
(一) 强固农业基础地位	(225)
(二) 长期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	(227)
(三) 提高农村经济素质和效益	(230)
(四) 实施均衡发展战略	(233)
三、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39)
(一) 告别小农经济	(239)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机制	(247)
第十章 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257)
一、跨世纪的“基础工程”	(257)
(一) 强固农村战斗堡垒	(257)
(二) 凝聚亿万民心	(260)
二、直接民主	(263)



(一) 村民自治的发展	(263)
(二) 村民自治的内容	(265)
(三) 村民自治的制度	(268)
三、依法治村	(269)
(一) 法治国家建设之需	(270)
(二) 农村法制新风	(271)
四、告别愚昧走向文明	(274)
(一) 农村现代化的根本	(275)
(二) 培养道德新风	(276)
(三) 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278)

第十一章 中国农村的新挑战和发展的新平台

(282)

一、农村发展的基本难题	(282)
(一) 农业基础的脆弱与环境压力	(282)
(二) 农民的出路与增收	(285)
(三) 农村社会的整合与进步	(288)
二、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290)
(一) 阶段性的新目标	(290)
(二) 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	(292)
三、中国农村持续发展的新平台	(296)
(一) 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296)
(二) 宝贵的历史经验	(298)
(三) 难得的发展机遇	(299)

附：农业产业化全国重点“龙头企业”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301)
----------------------	-------

第四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307)

一、治国安邦的战略抉择	(307)
(一)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307)



(二) 突破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310)
二、博大的内涵与全新的特征	(312)
(一)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312)
(二) 新农村建设的特征	(315)
三、把握重点与政策选择	(317)
(一) 重点是发展现代农业	(318)
(二) 完善的政策保证	(322)
(三) 新农村建设初战告捷	(326)
第十三章 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328)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征	(328)
(一) 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沿革	(328)
(二) 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与弊端	(330)
二、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335)
(一) 困难与挑战	(336)
(二) 启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系统工程	(338)
(三) 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原则	(340)
三、努力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340)
(一) 一个崭新时代的变革	(341)
(二) 战略举措的选择	(343)
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华西村	(346)
结束语：从传统到现代	(349)
一、60 年农村发展的辉煌成就	(349)
二、60 年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	(353)
三、60 年农村发展的主要特点	(360)
主要参考书目	(367)
后 记	(370)



绪 论

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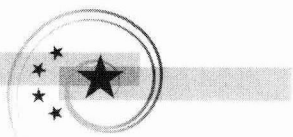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对中国农村的变革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定，天下定；在中国，没有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依据、模式、效果、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变革发展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进入近代，至今已近 170 年。为了研究共和国农村的变革发展道路，有必要回顾 20 世纪百年中国农村的变迁，研究近代中国的古老农村社会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总结近代中国各阶级、政党、政治派别和志士仁人改造中国农村的各种主张和方案，包括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把这一部分作为本书的绪论，首先展开中国农村百年变迁的历史画卷。

一、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动荡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家，曾创造过誉满全球的东方农业的奇迹，成为世界农业宝贵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农村不但没有实现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反而被西方的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所扭曲，传统农耕经济的停滞衰败使农村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农村发展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挑战。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掠夺，抑制了中国农村的变革。一方面，西方列强发动战争，打败清王朝，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土地，出现了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千千万万的农民丧失了土地。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 600 多平方公里为沙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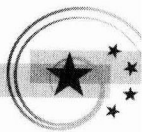


侵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的土地，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组织的“农民移民”32万人入侵中国，掠夺土地达3900万余公顷，移民直接占地229万余公顷。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农村作为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农业原材料的基地。列强还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就地设厂，就地生产，就地倾销商品。这些掠夺摧垮了中国农村原有的农工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使家庭手工业中断了向近代工业的发展，也使农业缺乏变革的内驱力。

第二，清末现代化的启动者们不注意农村的变革。清朝末年，政府的一些重臣为了力挽大清江山的衰败，寻找抵御列强的自强之道，企图启动中国现代化，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洋务运动”。清末现代化是在外力刺激下由政府重臣们强行启动的，而且是在城市孤军突进，与农村脱节。在中国封建时代，城乡的传统结构是城市与乡村共同建立在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城市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权所在地，是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以此向农村辐射，将一个个孤立和分散的农村地区置于王朝的专制之下，从而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只不过是农村人口在数量上的集聚。少数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孤军突进，必然导致与作为传统社会基本依托的广大农村相互分离。农村置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使农村陷入衰败与危机之中，城市现代化也缺乏持久的动力与基础。同时，清政府这时已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失败搞得内外交困，除了全力维护其统治外，已无更多的能力去保护和发展农业，农村和农业已沦为无人问津的放任自流境地。不仅如此，清政府既要负担战争赔款，又要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庞大的开支，耗尽了清政府的财力，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主要依靠田赋、盐税、茶税和以后增加的其他关税和厘金。光绪中叶，为了支付正在推行的“新政”费用和战争赔款，除了继续征收各种附加税外，还超过田税正额，允许各省自由筹款。结果各省的田赋附加税名目繁多，至宣统初年，“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①。这些名目繁多的赋税负担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村经济的破产，贫困农民被迫逃亡。而这又加深了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使自耕农沦为佃农，农村经济越发凋敝。

第三，由于清末工业化的启动靠的是对农业的挤压，结果导致了中国城乡经济二元化结构，即少数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对立。随着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302页，上海：三联书店，1957。



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导致近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有学者把这种对立概括为：“近代的城市生活与中世纪的农村生活相对立，用机器生产的城市工业与用手工劳动的农村农业相对立，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相对立，外国侵略者、城居大地主、大高利贷者、银行家、政府机关和官僚们所在的城市与贫苦农民居住的农村相对立，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的主要集中地城市与赋税、地租、利润的主要来源地农村相对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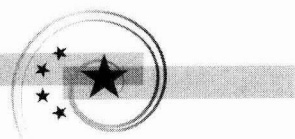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败，农村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耕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缩减，农村金融紧迫，农民生活恶化。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游民，到处流浪，或乞讨，或盗窃，或拐骗，或投身娼妓业，等等。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在20世纪30年代曾著书揭露帝国主义劫掠中国农村，导致中国农村破产的现实：“打破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主要动力，不是国内的新兴工业，而是帝国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面打破中国农村中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生产，破坏农村中的各种副业；一面又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来束缚都市工业，束缚整个国民经济，使它不能够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自由进行。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也是整个国民经济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还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农村以后，对于封建余孽，都是‘皇恩浩大’。他们非但没有肃清封建余孽，而且多少还在那里利用他们，通过他们而来剥削中国农民。这样中国的农民自然更加苦了，因为他们要受两个主子剥削。假使大主子（帝国主义）把手指向小主子（封建余孽）一点，那么小主子就会对农民猛击一拳；假使大主子把脚尖向小主子一蹴，那么小主子就会向农民猛踢一脚。你想！中国的农村怎么会破产呢？”^②

鸦片战争后，以王室、官吏等为主体的政治集团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军阀以及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官僚买办集团。农村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关系依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封建官僚、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列强，既占据农村，握有大量的土地，垄断农村政治与经济，又占据城市，握有商业高利贷资本，垄断工商业和贸易，加重封建地租剥削。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精英乡绅阶层向转型社会的渣

① 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41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②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5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滓——土豪劣绅蜕变。他们勾结地方官吏，称霸乡里，豪强、恶霸、地痞、流氓之辈占据了农村的中心位置。这些人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成为清末民初之地方割据、军阀崛起和国家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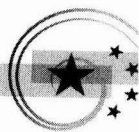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流为剽窃”，盗匪蜂起，农民暴动。有学者根据清王朝历朝实录统计，1866—1875年，民众运动达909次，1896—1911年，达653次。^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但是这个共和国很快就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强大的军阀势力所撕裂，国家的政治权力落到了形形色色的军阀之手，国家陷入了北洋军阀分裂割据之中。他们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各霸一方，军阀混战连绵不断，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动乱和灾难，使农村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渊藪。农村的政权基本上落入地主士绅之手，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90%以上的农村仍然是处于封建的落后的农业经济之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战胜了北洋军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然而，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遏止农村的衰败，克服农村的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清末以来乡村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矛盾，酿成了20世纪上半叶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了整合农村社会，在基层农村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恢复和建立了政权控制体系，扩大和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1927年至1939年推出了“新县制”，确立县以下的区、乡（镇）、保、甲四级组织。保甲是一种封建意义上的基层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化了保甲连坐制度，把它变成了党政军特合一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最基本形式。它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沉重锁链。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是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支柱，他们控制了农村基层政权。据有关资料统计，国民党政府县以下官吏中90%是地主和富农。农村的基层政权几乎是清一色地由地主直接掌握。据江苏民政厅的统计，1931年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的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这些地主中43.27%为中等地主，56.73%为小地主。其中的59个村长，平均每户有地44亩，有45个村长，平均每户有地224亩。^②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的

^① 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59页注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商业高利贷》，上海：上海黎明书局，1937。



政治组织充满着豪绅封建势力，地主在农村居于绝对的全面统治地位，农村政治、司法、行政、武装、经济、商业、金融、税收、教育等权力都掌握在地主手里，地主的势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大地主的势力和权力更大，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城镇，通过在农村的代理人来行使权力，每一个地方的大地主可以说是当地地主营垒中的一座堡垒，是当地中小地主所依附的力量。他们集合在一起，顽固地维系农村的封建关系，阻止农村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产品出口锐减，粮价低落，大量破产农民外出逃荒，荒地面积增大。30 年代初，以农立国的中国却不得不每年从国外进口 18 000 万担至 26 000 万担粮食。^① 农业危机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而国民党政权却始终坚持专制独裁。战乱不止，赋税苛重，农村和农业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最大牺牲品。加之土豪劣绅与恶霸流氓横行乡里，导致了农村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急剧崩溃。一位日本人这样描述中国北方农村当时的情况：“犹如恶魔四处游荡，纵火、偷盗和抢劫随处可见，谋杀、绑架竟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队征粮，土匪抢粮，大大小小的军阀武装夺走了农民更多的粮食。有时一天内农民要被他们洗劫 2~3 次。土匪和军阀武装还偷鸡摸狗。农民们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悲惨。他们不得不扶老携幼弃家出走，逃往满洲和南方地区，逃难的浪潮就像无尽的波涛，无论时间流逝多久，同样的情景依旧发生。”^② 薛暮桥在他 20 世纪 30 年代的著述中，也描述了自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到抗战正式爆发以前华北、西北地区连年不断的水旱灾害，灾民几千万，财产损失无数，农村经济总崩溃。“在这情势下，中国农民的生活就陷入最悲惨的境地。树皮草根成了各地贫苦农民的普通食料；1936 年春荒声中，皖西和川北更普遍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甚至于把人肉煮汤出卖。”^③ 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中国 22 年，不仅没有使中国农村摆脱困境和衰败，反而导致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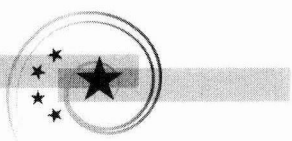
二、农村发展的桎梏

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313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 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70 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③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95~96 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实质上就是农村社会或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是生存的保障，国家的赋税主要来自土地和农户，而农户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所以，土地一直是封建社会各种人物追逐的资源和对象。封建的土地制度，从所有制结构讲，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前者实际上是虚化的，是皇帝及其家族的代名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封建社会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皇族私人土地所有制。后者主要包括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从经营方式讲，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采取分散的耕作形式。这种土地制度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地权集中而使用分散，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一方面，地主、官僚等少数人拥有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地主、官僚掌握的大量土地分别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作为掠夺农民的基本手段，即收取高额地租，进行封建剥削。有学者研究后得出：“地租一般占总收获量的50%，甚至占80%”，“这比投资工商业稳妥无风险，这就刺激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买办高利贷者竞相兼并土地，无视农业经营，严重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这种封建土地关系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②，是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解放的桎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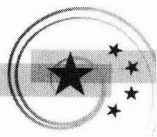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③。正因为这样，所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陷入了更深的灾难，封建土地制度不但未能防止外部社会对农业的破坏，而且还成了这种破坏的有利工具。在近代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综合各方面的调查研究统计数据，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8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许多国家。20世纪20年代，瑞士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荷兰为12%，英国为30%，比利时为22%，美国为33%，德国为35%，日本为56%。^④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在耕地方面，据学者调查统计，1929—1933

① 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2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④ 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3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年，全国已耕的土地面积为1 416 956 300亩^①，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这远远低于世界各国的耕地指数。中国人口居于各国之首，土地总面积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耕地指数低于大多数国家，说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中国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也远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综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专家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人均拥有的耕地约3.11亩左右。而当时德国人均耕地为5.20亩，奥地利为4.80亩，比利时为2.50亩，保加利亚为10.30亩，丹麦为12.40亩，西班牙为11.80亩，法国为9.0亩，英国为2.0亩，匈牙利为10.70亩，意大利为5.30亩，荷兰为2.0亩，波兰为10.20亩，罗马尼亚为11.60亩，瑞典为10.30亩，加拿大为40.0亩，美国为19.30亩，阿根廷为33.60亩，印度（英领）8.10亩，自治印度为7.30亩，日本为1.6亩，澳洲为24.4亩。^②上述21个国家和地区平均人均耕地面积为11.37亩，中国与其相比，低了3.7倍。近代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又占了绝大多数，这为世界所罕见。中国虽然是一个土地面积辽阔的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占有量很低，这同样为世界所罕见。因此，在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制度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制度。鸦片战争后，这种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并没有改变，而且从这以后，农村土地兼并，地权不断集中于少数私人地主之手。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正式施行东北及内蒙古放垦政策，并承认旗地的自由买卖，各省行政当局对屯田、学田、公田、官荒等也公开或秘密出卖，这就为一些官僚、豪绅、商人利用各种特权，以极低廉的代价或不费任何代价，大规模占有土地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推进了官地公地私有化的进程。据统计，20世纪初，中国农户占全国总户数的90%，其中无地者占70%，地主阶级已从土地所有者变成土地垄断者。

20世纪初，部分官僚、绅士和商人在江苏、天津、安徽、广东、福建等地设立了一些农牧垦殖公司。这些公司既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有很强的封建性。它们以近代方法从事农业经营，又往往招佃出租和进行土地投机；既有民族资本，又有官僚资本。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民国时期，仍然沿袭着封建土地制度。这一时期如果说与辛亥革命前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各类军阀、官吏依靠军事政治的权势，采用低价强买、武力霸占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在很短时间里迅速集中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5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② 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371~3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